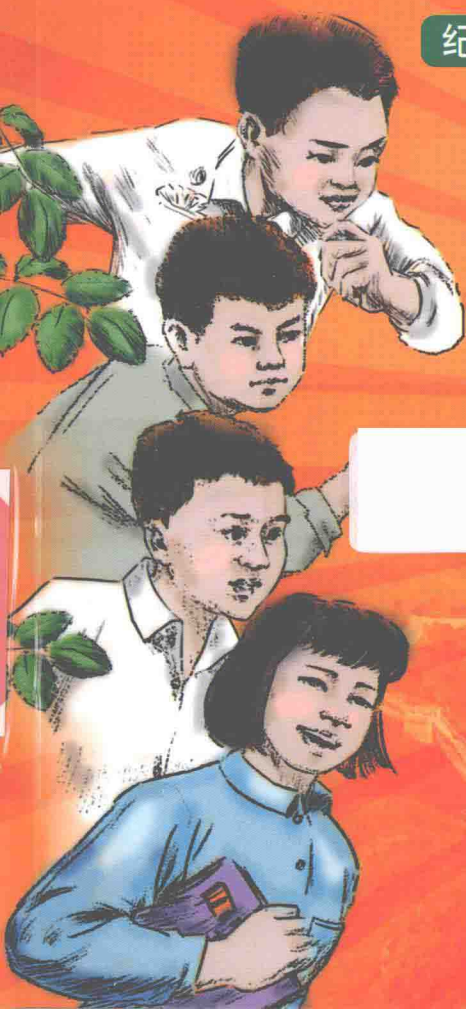


童年时的 抗日行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 张锦贻◎著 |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童年时的抗日行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张锦贻◎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时的抗日行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张锦贻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555-0466-5

I. ①童…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87.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1297号

童年时的抗日行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作 者 张锦贻

总 策 划 杨 敏

责任编辑 杨 敏

装帧设计 韩 芳

绘 图 王 鸽 安 旭 赵 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68千

印 张 5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466-5

定 价 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

纪念那些曾经的抗日少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

是遥远记忆中的一段历史，

是历史前行中的一段记忆。

童年抗日，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却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

张锦贻，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嘉善。

儿童文学理论家、作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

已出版的论著主要有《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冰心评传》《张天翼评传》《包蕾评传》及《儿童文学原理》《幼儿文学概论》（合著）等。创作中篇童话《小气球奇遇记》，散文集《草原，一个童话世界》《边边的边疆上》，故事集《爸妈快乐 小孩快乐》等，深受儿童喜爱。

她的作品多次获“索龙嘎”文学奖、内蒙古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内蒙古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获中宣部等十部委联合颁发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荣誉奖、建国六十周年“内蒙古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MU LU

目 录

- 001 一 在全民抗日的年代中长大
- 026 二 识字句读诗词 知爱国懂抗敌
- 042 三 看报 读书 演戏 抗日
- 059 四 反抗日本来的“女教师”
- 084 五 掩护大人抗日
- 108 六 我们是抗日阵线中的生力军
- 122 七 桑林里的“抗日战争”
- 137 八 心中的“毕业歌”

一 在全民抗日的年代中长大

本来，四五岁，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小不点儿，可是，日本鬼子侵略到中国，欺侮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一下子长大了，我们的心比有的大人的心还要大。是与非，爱与憎，我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们无论怎样地多吃饭、吊树丫、游狗爬，都没有一下子长高。

我出生，是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四年初，距离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三个年头。我家在杭州，住在浙江省图书馆斜对面那座浙大教授宿舍楼里。只是，在大学教书的父亲没有来得及看我一眼就去世了。三个哥哥比我大十岁、十一岁、十二岁，都已上了中学。他们放学以后，就轮流抱我到浙江图书馆院内的花坛边玩。至今



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的，只有写在墙上的四个大字和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抗日到底！**还有旁边画着的一个大大的拳头。按说，还没有到记事的年龄，可是，哥哥们天天指着那四个字、那一个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日子长了，这字的意思，这拳头的意义，也就隐隐约约地印在我那刚刚翻开的心页上；我，也就朦朦胧胧地晓得要打那从东洋来、想要欺侮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听哥哥们说，我那时，只要一听见“东洋”和“鬼子”的字眼，马上就会握紧拳头，挥舞着，冲上去，大声地喊叫：“打！打！打！”与周围的大人们齐心合力、同仇敌忾。

一九三七年，接连发生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从北京到上海，日军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印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天天在上海、杭州的天空上飞，轰隆、轰隆地吼叫着，接着，这里那里就会传来嘣嘣、嘣嘣的爆裂声。长江支流上的一座座石桥被炸塌，马路两旁的一栋栋木楼被烧毁。日军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连连，血流成河。大哥、二哥都随学校迁往浙东游击区。母亲带着三哥和不到三周岁的我回老家去避难。为了避开日军的轰炸，火

车都在夜间行驶。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拎一只网篮，三哥提一只小皮箱，臂膊上挽一条绒毯。在候车厅昏黄的灯光下，我已经晒得睁不开眼睛，在母亲的臂弯中沉沉睡去；却又总是听见有人在大声地讲话，但听着总是很遥远。突然，有一个声音重重地压下来：**抗日到底！**啊，这句话我懂！是不是握紧拳头的那个人要领着大家去打日本鬼子了？我一下子睁开眼睛，我想要找到这个人，想要跟着这个人去打掉鬼子的飞机、去缴来鬼子的枪支。顿时，睡意没有了，精神提起了。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是许许多多比我三哥还要高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拿着话筒，给大家讲日军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讲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必胜信念。然后，他们高唱抗日歌曲。当他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就把手掌当作大刀，挥舞着，砍杀着，嘴里也不停地“唱”着。这时，有一位大姐姐背着一个纸箱走过来，纸箱上写着四个毛笔大字：**抗日到底！**这位大姐姐说，请大家为驻沪抗日部队捐些钱。母亲拿出钱来，我拿着塞进纸箱上的“投币口”。周围的人都说我是一个抗日爱国的好孩子，我很开心。



我的老家是江浙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城不大，但因它位于沪杭铁路线的正中间而显得很重要。那时，从上海撤下来的日军就驻扎在这里。那些河边巷子里的深宅大院都被日军抢占了。那里，日日夜夜都有蛮横的日军把守着，他们手里端着亮了刺刀的长杆枪，一旁蹲着吐着舌头的大狼狗，一看见有人走过来，就立即大声喝问，强行搜查，不知道他们是想要以此吓唬中国老百姓，还是被这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百姓们吓着了。就在前两天的一个清早，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急匆匆向这里走来，那边巷口正是一个儿科诊所。刚刚接岗的日军还没有来得及站定，那位妇女顺手就把“婴儿”扔进了门里，猛烈的爆炸声把还在做梦的宪兵司令、大小队长一起轰了出来。虽然只炸死了那个兵和那条狗，却把那些从东洋跑来这里杀人放火的日军头目们吓个半死。他们调集了全城的日军，戒严、盘查，鸣枪、拷问，也找不到那个扔炸药的人。狡猾的日本鬼子猜测，这座城里一定有人在指挥人们的抗日行动。只是，那几个上蹿下跳的汉奸、翻译，那些人数不少的保安队，都提供不出他们想要的“情报”。

于是，他们费尽心机，想出计策。不知什么时候，城中心那座谁都知道的亭桥边，在那个东侧傍河、南面对街、西北边是花圃的富家小楼的大门顶墙上，画上了一个鲜红色的、端端正正的“+”字，大门右侧挂出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写着“防疫治疗所”。大门左边贴着一份公告，其中有一条“规定”十分引人注目。那条规定是：为三到六岁儿童免费接种牛痘、打防疫针，并为“良民”免费治疗。这里的医生、护士都是女的，都说着江浙一带的方言；但在没有旁人时，她们之间说的是日语。实际上，上学前的小孩子，除了这里，没处去种牛痘和打防疫针。这样，她们就了解了这座城里的学前儿童的情况。然后，就以“服务”“回访”的名义，她们会主动地到一些人家去。有时，“热情”地跟大人们谈天，有时，“专心”地和小孩子说话。她们还常常为小孩子带一些糖果、食品，显得十分亲近和亲切。

这时，三哥已外出求学。母亲和我，与姨母同住。姨父在南京任职，不常回来。我在两岁前就开始识字，姨父每次回来都教我读背唐诗，三四岁时已能背诵不少比较简易的古诗词，而且能够凭着书前的绣



像和书中的插画来读书，跳着读，猜着读，也能读懂一些故事。这样，我就常常被亲友们称赞为“天资聪明”“悟性灵异”，许多比我大的孩子都愿意来跟我结交。我教他们诵读的爱国诗词，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我给他们讲述的人物故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宋史·寇准传》，都能很快地传播开来。小小的我，似乎还有一点影响力呢。再加上姨母家有大书房大书橱，藏书之多在当地有点名气；家里又只有姨母、母亲、我三口人，很是清静。亲友中的读书人就都常来，从上海、杭州逃难来的哥哥们的同学也常来。不时地，就常有激扬的谈话声，如“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和昂扬的唱歌声，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谁愿意做奴隶……”传出墙外。于是，就常有“防疫治疗所”的大夫背着诊疗箱光顾我家。我因为是早产的遗腹女，个子小，她们就说我发育得不好，带来了当时市面上见不到的奶粉，以及小孩子们喜欢的松子糖、棒棒糖，临走时对母亲和姨母说，小孩子总是读古诗古书不好，她们就留下了一本不知是谁编的“日中亲善 东亚共荣”的歌曲集，还留下很多

张可以到日军营地看电影的票。这以后，有一位大夫就跟我家“常来常往”了，说话的内容也慢慢地转移到来我家的那些人、那些事，她似乎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最爱讲日本人的坏话？是谁总是说“日本人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这样难听的话？是谁不断地教江南的小孩子们唱那些东北的、欧洲的歌？不过，她从来不当着大人的面问我这些事，也从来不逼问，而是好像她很喜欢这些人，很想认识这些人，甚至想着跟这些人做朋友哩。只是，我虽然还不懂很多的事，却已是感觉到这位大夫的意思。她是想从小孩子这里知道这些“谁”的名字、住址，知道这些“谁”的行为、动静；而且，巴不得我能够带着她去“看望”他们。我把这位大夫的话告诉母亲和姨母。母亲和姨母没有说话，只是让我悄悄地去告诉那些“谁”们。“谁”们就仔细地听，又仔细地告诉我怎样跟这位“大夫”说话，怎样来回答她的问话。此后，我又约了两三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小孩子，一起到“防疫治疗所”去讨要“人丹”和“药膏”，这时又总有人急着要上厕所，或是随意地走进里间去看墙上的挂图。我还约了好几个“谁”家的小孩子，又请哥哥们的同学扮成老年



人，领着我们到日军驻地去看电影。那都是放假的日子，我们又都是拿着“票”进来的，日本人也就不在意。我们就按照事先计划好的，各自注意、记好“一点”。电影里的日本话大家本来听不懂，看电影不过是一个由头。但是，当我们看到那面白底子上有个红圆点的旗子在银幕上舞动，在那面旗子下中国人被鞭打被屠杀、东洋鬼子却在喊叫在狞笑时，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中国小孩子，感到恐怖，也感到了耻辱。自然而然地，不用大人们讲解，我们就懂得了“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这些话的含义和重量。

那些日子，最让小孩子们愤恨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一队队日军踏着东洋大皮靴从这座小城的街上走过。这种为了跨洋侵略长途走路而特制的硬皮底，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古城的石板路，发出“咚、咚”的响声，震动了绷在小孩子心琴上那根永久响着爱国爱家乡旋律的心弦，震颤着藏在小孩子胸膛里的那颗恒久浸渍了热血热情的热爱美好生活的心灵。本来，四五岁，还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小不点儿，可是，日本鬼子侵略到中国，欺侮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一下子长大了，我们的心比有的大人的心还要大。是与非，爱与

憎，我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们无论怎样地多吃饭、吊树丫、游狗爬，都没有一下子长高。

那些“谁”们就对我和其他的小孩子们说，小，有“小”的好，不被当地汉奸注意到，不被日本机关登记到，也不被宪兵特务侦察到，更方便做“抗日”工作啊。想一想，小小年纪就能做“抗日”工作，大家心里都有几分得意。

那时，离姨母家不远的卖鱼桥北堍的一间小屋里，住着祖孙仨。五十多岁的祖母带着十四岁的大孙子小康和五岁的小孙子小泰。小康和小泰是堂兄弟，他们的父亲都被日军拉了劳工，母亲都得瘟病死了。如今，小康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帮着端盘子擦桌子跑腿子。厨房里烧饭菜的都是年龄稍大的当地人，小康就把脏活累活都揽到自己头上，每天清早去，黑夜回。大家看他一个还没有长大的人就要养活全家，也都关照他，黑夜回家时给他在篮子里装一些剩下的饭菜，带回去给祖母和弟弟吃。所以他虽在日本人那里干活，却是死帮中国人、恨死日本人。我们就常去跟小泰玩，还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适合少年读的书送给他。从他那里，我们就会知道日军的



一切动静：日军头目在或不在，他们上级来或不来；当地哪些人是日本人的座上客，哪些人是真正的奸细；以及是否抓了“共产党”，是否下乡“清剿”等等，都是很准确的。有一次，沪杭地区日本宪兵的总头目来这里视察，为了隐蔽，坐半夜的火车回上海。火车中途只停一次加水，可就在加水时，那节坐着总头目的车厢被炸毁了。

有一天，姨母家附近的太平桥小学里，来了一个乡下来的大个子插班女生，十五岁了，才上初小四年级，还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妹妹一起上学。这样的事学校是不允许的，但经不起她再三苦苦地哀求，就默许了。原来，日本鬼子常常到乡下去，以“扫荡”为名抢稻米豆薯、抢鸡鸭猪羊，还要抢花姑娘。惶恐之中，父母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在城里日伪政府当秘书的远亲。她就说她年龄还小，原先上学上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就先让她上几年学吧。城里的男家也就答应了。可是她不放心的小妹妹啊，就自作主张带来了。幸好，这个小妹妹很乖，上课时，就独自坐在校园里的石阶上抓石子玩，或是偷偷地站到教室门外听老师讲课；一到下午，总有班级上音乐和体育课，她就在一

旁跟着唱歌或是帮着捡球。日子长了，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不但不嫌她，还蛮喜欢哩。我知道了，就领她到我家来看书，还教她读古诗词。因为城小，小孩子们彼此熟悉都很快。她，在学校里，是一个不交学费的自由的“旁听生”；回到她姐姐的那个家里，又因为她小，来来往往的大人们说话做事都不避她，而她却是个眼尖耳快、心灵思敏的“小人儿”。日本鬼子最坏，日本鬼子打杀中国人，她都亲眼见了的。她恨日本鬼子，想着打跑日本鬼子，是一种天然的情感。于是她就把伪政府那些人的所说所行，把她“姐夫”的时来时去，把学校里日语教师的忽喜忽怒，都仔细地对我说，也对那些来我家的“谁”们说。而当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告诉她，某人是奸细、某人是坏蛋时，她也总是听得很专心。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她过来跟我咬耳朵说话，说某人昨天在他家吃油爆虾，她姐姐把刚出锅的看相最大最红的那只夹到那人面前的碟子里，他猴急地往嘴里塞，把嘴颊里的皮都烫掉了，疼得龇牙咧嘴，也不敢说责怪的话。又说另一个某人雨天到她家蹭饭，她姐姐就专给他烧满身细刺的细尾鲤鱼吃，呛着了，噎着了，又不敢大咳，不敢埋怨；等

